

解码曾光明

对许多人来说，曾光明是个“谜”。他的“谜”不只是说他的事业，他是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人才基金获得者，是863国家高技术计划环境领域（首届）主题专家中最年轻的一位；他在国际环境研究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除了国内任职之外还有不少国外相关机构的任职；还有他做事的风格，学生说他只要下决心想做就一定成，比如他主持的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人虽少却是湖南大学乃至全中国“环工系”发展最快的院系；更多的“谜”也许还是他的性格在许多人眼中的近乎偏执怪异却又平易随和，……或许也还可能多少有些许争议。

搞饭吃

从“七张嘴”到“泛黄日历”

43年前，曾光明生长在湖南华容县城一个并不富足的普通人家。用他今天的话说，母亲没有文化，斗大字认不了一箩筐，然而一个与他形影相随的镜头让他至今铭心不忘：傍晚时分，母亲默默地拿块抹布走到桌前，扶着煤油灯，对着灯罩，一点点地擦着，擦着，直到亮到她认为不用擦了为止。尔后，当夜幕拉下，母亲又悄没声地开始在油灯旁用针线嵌着鞋垫子抑或其它衣物，每每此时，童年的他都在一旁看书学习。曾光明就是在这样一个并非书香的书香环境里，一步步刻苦攻读，直到博士毕业，陪伴他一路走来的始终是父母殷切期待的目光。

“一个男人至少要负担七张嘴：老婆、小孩、父母、岳父母。”他骑下几乎每个人都熟谙他的“七张嘴”之说。

是责任，一个人对生养自己的父母、自己的骨肉嫡亲都不尽责，岂非枉来人世？

完成了学业，意味着一段路程的结束，另一段路程的开始。因为妻子在长沙，曾光明毕业后就到了湖南大学。1988年7月13号，是他人生里程碑上的一个日子，因为这一天他来湖南大学报到。周围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么的陌生，事业上孤单，生活上拮据，是他开始独立人生后遭遇的第一个挑战。

他的办公室门背面挂着的一张不足16开的泛黄的日历卡：

时间：1991年——2001年。上边用红色笔标了一个个记号，1、2、3、4、5……足足16个红点。

“那是我人生低谷时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当时我总在自问，哪一天咸鱼可以翻身，才能变成一个有用的人，才不会这样困难？我就用这个来激励我。这上边每一个红点都是我的一次小的成功，就像一招招棋。第一个点是2000元的一个小合同，这个点就是签30万元的比较大的合同，没有6月份第一个小合同就不会有9月份这个大合同，这是转折点……”

看着那一片密密麻麻，我的脑海里仿佛映现出一个文理交织的密码图，一个激情四射的学者正在用他特有的智慧破译那上面的一个个难题。

从朴素得那么透彻的“七张嘴”之说，到为了一个系的饭碗，乃至全中国、全世界的饭碗，这是曾光明的胸怀。他让我记起一句伟人名言，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联想曾光明的“搞饭吃”其实是俗得无比深刻。

找缺口

从两个突破到立系立足

翻开有关曾光明的简历介绍，会看到他的一大堆头衔和一连串“领先”的成就。而他作为系主任，也因此奠定了湖南大学环工系在全国同行的位置，并且在国际舞台上有一席之地。

“我要在省内，在国内，在全世界立系，就对自己的背景反复研究，找出缺口，确立了两个突破点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

一个是基于不确定理论的环境系统分析，也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人才基金项目。其基本观点是：确定性的东西是相对的，不确定的东西是绝对的。

曾光明称这是一个系列的方法，有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同行公认最好，水平最高。

“国外用我们教材，引用频次很高，很多老外写信向我们索要论文、软件资料。”

他一再讲到他的挚友——加拿大 REGINA 大学教授、湖南大学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黄国和博士，这实际上是他们在最初没有经费、没人指导的艰难的状态下坚持了 20 年的一个研究方向，他说还可能做 30 年。

再一个突破点是搞固体废物资源化研究，也是“863”高科技攻关项目及科技部国际合作重点资助项目。

固体废物中有两类：有机废物和无机废物。无机就是石头、铁，等等。铁分捡出来回炼钢厂溶解；石头分解出来填埋，曾光明认为那里边缺少科学，不如做有机的，里边有细菌有化学问题微生物问题。

“过去做城市生活垃圾堆肥全世界都在做，但大家都觉得这问题简单——不就是找个坑放进去变成肥吗？实际上这里边有时间长短问题——我们研究细菌，把有机物变成肥料的科学方法有很多问题要研究，时间一短就是科研成果，而且这里边的研究怎么做都做不完，比如开始 56 天，变成 55 天，50 天，都是很了不起的成果。”

曾光明就这样慢慢往前做。首先是细菌作用、表面活性剂作用，等等。这样作用，那样作用，慢慢研究，最后确定了这样一种方向，就开始自己做，带学生做。他说起初自己也不太有信心，但很快发明专利出来了，在国际刊物文章出来了。

“我自己做得不错，就‘鼓吹’学生吸引学生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一起做，就这样做起来了。国内给钱，国际上很多人也来做，越炒越热。到现在，这个方向论文发表了近 200 篇，在国际大会上报告约七八次，发明专利申请了 22 项。实际应用和示范工程做得也很不错。”

“怪”思维

从《水浒》情结到关注细节

不知为什么，年少时的曾光明就喜欢上了《水浒传》。他至今记得小学五年级时大气候正在批“水浒”，可他偏偏就是喜欢得如醉如痴，以至于有时挑灯夜战读水浒，母亲却蒙在鼓里欣赏儿子在刻苦读书。

“常会跟学生讲水浒吗？”

曾光明不正面回答，却自我鉴定讲义气讲感情。他说大的方面——人要有中国心，小的方面是‘七张嘴’。他理解“水浒”的“义”就体现在这些，是责任。

他的责任体现俯拾皆是，只是方式不同。他的实验室在做废水炼油课题研究，成果出来以后要把它推广到社会上，就有企业要与其合作。不同于一般人的是，他只要对方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比如征地、买设备；只要对方认同亏赢责任要企业自我承担，而他曾光明，只用两三句话，无需合同，无需协议，对方企业就会卖劲地往前做，就把事情做成了。

“他成了，我的成果得到实现了，我高兴，他也高兴——双赢。”

当然，这要有两个基于自己实力和人品的前提：一是已经取得的成就；二是做事诚信的口碑。

“我觉得很多事都很简单，关键要有自己的正直，有自己的判断。”

象聊家常一样，我和曾光明的交谈进入《成功决定细节》，他向我推荐这本书。

“所有的学生给我发邮件我必回复，只是字多少的问题，这也是我的细节。”

“每年全系的新生开学典礼及老生毕业典礼，我一定参加，一定是西装领带，讲话稿一定事先背熟。”

不仅如此，有学生结婚，曾光明一定会送红包，婚礼上的讲话也一定要事先准备好并背熟。

“身教重于言教”，他是随时随地在给现身说法，“不讲话则已，要讲话一定讲好；不露面就不露面，一露面一定要体体面面。”学生有升迁一类喜事，他也必送红包却躲开送行的应酬，“你走时我不请，等你走了以后我再请。”

其实，学生们不知他们的导师这些年一直在隐姓埋名地资助了很多校外媒体报道的贫困生，“我是通过媒体一次性给他们钱，因此他们只知道是湖大教授。”

“我当老师肯定是称职老师，当父亲肯定是称职父亲。”

这样的细节里蕴涵着这样的责任，而这样的责任铸就了这样的个性。

对许多人来说，曾光明是个“谜”。他的“谜”不只是说他的事业，他是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人才基金获得者，是如今“863”国家高技术计划环境领域（首届）主题专家中最年轻的一位；他在国际环境研究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除了国内任职之外还有不少国外相关机构的任职；还有他做事的风格，学生说他只要下定决心做就一定成，比如他主持的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人虽少却是湖南大学乃至全中国“环工系”发展最快的院系；他既做系主任，把所在院系管理得井井有条，又在教学科研成果方面多产高产；他既操心系里的网页设计乃至每日信息的上传、处理，也“干涉”自己学生的穿衣带帽、言谈举止，事无巨细。更多的“谜”也许还是他的性格在许多人眼中的近乎偏执怪异却又平易随和，傲骨与谦和相融，“贵族”与“平民”合一……或许也还可能多少有些许争议。

解码曾光明

面对媒体，曾光明并不乐观，他曾经固执地认为成功靠的是实干，无须宣传，也曾不无根据地误会媒体介入搞不好会惹祸上身，招来麻烦。还好，他相信亲历后的感觉——

那是一年前在环工系的会议室，第一次和曾光明谋面，我们一行五人去做调研，自然是他主讲，因为他不意识这之后会有什么文章发表，稍一落座，话匣子打开便一泻千里，激情澎湃的话语中透着南国男子少有的爽快、练达。

紧随其后是一段“神交”，一篇关于他谈人才的千余字文——《竞争拼的是实力》的送审过程，或电话，或Email，黑字上缜密圈红颜色，直至无懈可击，方才应允放行，见诸报端。

相信这时他是轻松的，也才有了第二次。

两个月前一个有着和煦阳光的下午，只有我和他，从会议室谈到他的办公室，出于信任，他给了我令人叫“爽”的酣畅淋漓，没有掩饰，没有雕琢，甚如童叟至交般的没有距离。那一刻，我以为，一个记者解码一个学者曾光明的任务有了彼此满意的结局。

解码一：搞饭吃——从“七张嘴”到“泛黄日历”

您有恪守的人生信条吗？

就是搞饭吃。

您做事的主要兴奋点在哪？

还是搞饭吃。

这个饭有不同等级的饭，有五星级的饭，也有大排档的饭，您搞什么饭？

不光是自己，也是群体。

——曾光明采访实录

我的笔落在“曾光明”这个名字上时感觉很不寻常，一如他的个性偏执且颇多磁场。想来和他交谈，送进你耳畔的实在是太生活也太不合流的语言，比如问及他的研究动力源，他没有通常科学家惯用的兴趣、好奇心这样的字眼，而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俗语“搞饭吃”，——“开始‘搞饭吃’，后来‘搞饭吃’，现在还是‘搞饭吃’”。

这种看似戏言的大白话出自一位卓有建树的知名教授，乍一听着实叫人无从下笔，而一旦徜徉在他的世界里去体会，去品嚼，心得则大有不同。

43年前，曾光明生长在湖南华容县城一个并不富足的普通人家。用他今天的话说，母亲没有文化，斗大字认不了一箩筐，然而一个与他形影相随的镜头让他至今铭心不忘：

傍晚时分，母亲默默地拿块抹布走到桌前，扶着煤油灯，对着灯罩，一点点地擦着，擦着，直到亮到她认为不用擦了为止。尔后，当夜幕拉下，母亲又悄没声地开始在油灯旁用针线嵌着鞋垫子抑或其它衣物，每每此时，童年的他都在一旁看书学习。

“只要我在读书，甚至只要感觉我在读书，母亲脸上就会流露出兴奋和希望。”他沉醉在回忆当中，继续跟我说，父亲话不多，只是说父母再苦再累也一定会供他读书，要他不停地往上读。

曾光明就是在这样一个并非书香的书香环境里，一步步刻苦攻读，直到博士毕业，陪伴他一路走来的始终是父母殷切期待的目光。

“一个男人至少要负担七张嘴：老婆、小孩、父母、岳父母。”他骑下几乎每个人都熟谙他的“七张嘴”之说。

是责任，一个人对生养自己的父母、自己的骨肉嫡亲都不尽责，岂非枉来人世？

完成了学业，意味着一段路程的结束，另一段路程的开始。因为妻子在长沙，曾光明毕业后就到了湖南大学。1988年7月13号，是他人生里程碑上的一个日子，因为这一天他来湖南大学报到。周围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么的陌生，事业上孤单，生活上拮据，是他开始独立人生后遭遇的第一个挑战。

一日回老家探亲，看到母亲那么大年纪了还在干那么重的体力活，他心疼不已，原本就是“大孝子”的他，感觉到自己慢慢大了，成了家，有了儿子，可父母却老了，看着母亲已经有些佝偻的背影，顿时一股强烈的自责涌上心头。

他想做些科研，但博士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得不到现在这样重视。博士毕业五六年了，口袋里还经常是只有5块钱，窘得连买复印纸的钱都付不起。

他要改变现状，在他就是“开始搞饭吃。”

他的办公室门背面挂着的一张不足16开的泛黄的日历卡告诉我们：

时间：1991年——2001年。上边用红色笔标了一个个记号，1、2、3、4、5……足足16个红点。

“那是我人生低谷时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当时我总在自问，哪一天咸鱼可以翻身，才能变成一个有用的人，才不会这样困难？我就用这个来激励我。这上边每一个红点都是我的一次小的成功，就像一招招棋。第一个点是2000元的一个小合同，这个点就是签30万元的比较大的合同，没有6月份第一个小合同就不会有9月份这个大合同，这是转折点……”

做学问的人都知道，在高校研究领域，合同就是课题就是项目就意味着经费，曾光明可以用它来支撑自身的课题研究，也可贴补学生参与研究的所需经费，同时还可以借此拓宽学术研究领域。“金钱不是万能的，没钱万万不能。”

“人生是一盘棋子，盘盘有招数，到现在您已经下了几招？”曾光明并不正面作答先前记者的提问，而是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记录让人意会。

看着那一片密密麻麻，我的脑海里仿佛映现出一个文理交织的密码图，一个激情四射的学者正在用他特有的智慧破译那上面的一个个难题。

从朴素得那么透彻的“七张嘴”之说，到为了一个系的饭碗，乃至全中国、全世界的饭碗，这是曾光明的胸怀。他让我记起一句伟人名言，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联想曾光明的“搞饭吃”其实是俗得无比深刻。

生存是发展的前提，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能够自力更生解决吃饭问题，谁能说不是能力？一个人不仅可以为自己而且能够为他人为更多人解决生计问题，所谓施恩于民，救民于火，又有谁能说不是功绩？

解码二：读眼神——从三个眼神到绝不丢人。

出国后感情升华，觉得中华民族不够强大的原因主要是人的素质跟不上，我们需要很多“厉害”的人。作为老师应该尽可能多地为国家培养优秀的人才。

国际舞台上我们代表的是中国教授，中国的硕士、博士，要完善自己，不能让别人看不起我们。

有什么事情触动您产生这样的想法？

——曾光明采访实录

1992年，时值而立之年的曾光明如愿公派赴法国。走出国门让他看到了另一片天空，也找到了需要强大需要提高的理由。至今他已多次出国，分别在法国、加拿大、德国留学、访问、做博士后研究、组织和参加国际会议、合作研究等等。

接着记者的问话，曾光明提起至今萦绕在他心头挥之不去的三个环境下的三个眼神：

——我在法国时的实验室老板看有的中国学者抽烟那种鄙视的眼神，就象看地痞流氓。自此我绝对不再抽烟。

——一次接待“老外”来访，我用过去同样的话自我介绍：我们系有十几个教授，有四十几个教职工员工。说着说着，我突然从这个“老外”看我的眼神中发现问题了：一个系一个院一个学校乃至一个国家，绝不是你有多少教授就怎么样，而是要问你这么多教职工员工一年出多少SCI论文？有多少科研经费？培养了多少学生？

——一位与我交往密切的英国教授在法国访问期间与我共进午餐时问我：香港要回归中国了，你作为中国人现在什么感受啊？我说，很高兴啊。这时我注意到他的眼神一直在盯着我。我非常敏感地意识到问题来了，我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是在嘲笑我们中国。就象自己的母亲、女儿被人霸占了很久，还到你手上能有什么感觉？这是否是他的本意直到现在我不得而知，只看到他也很难堪，对我连说“对不起”就走了。

“过去我唱国歌唱不全，后来出国了，唱得非常熟。”

“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冒着敌人的炮火……。”曾光明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他说国歌很动人，在国外时，凡大使馆寄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他都要仔细研究。

这三个环境中的三件事留下的三个眼神早已烙在了曾光明的心上，进入了他的血脉骨髓，他知道所有这些敏感都源于他对自己祖国的民族自尊。他从中读到的是中国需要强大，中国

人的素质要跟上去，要多培养“厉害”的人，优秀的人。而作为老师，一个教育工作者的使命也恰在于此。

民族自尊从身边体现。1996

解码三：找缺口——从两个突破到立系立足

您作为系主任、知名学者，一年要做几件事？

主要是当老师，完成自己的事，系里的事努力做，学校定的目标，自己能完成可以接受，完不成，只要大家努力了，也不责怪。

我不太相信权威，而相信自己的判断，别人说什么我只当作参考，很多事情，包括有时申请大项目，都象打仗一样走独木桥。

把攻克一个项目当成一个战役一个堡垒，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

——曾光明采访实录

翻开有关曾光明的简历介绍，会看到他的一大堆头衔和一连串“领先”的成就。而他作为系主任，也因此奠定了湖南大学环工系在全国同行的位置，并且在国际舞台上有一席之地。

“我要在省内，在国内，在全世界立系，就对自己的背景反复研究，找出缺口，确立了两个突破点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

一个是基于不确定理论的环境系统分析，也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人才基金项目。其基本观点是：确定性的东西是相对的，不确定的东西是绝对的。一个事物，比如规划结果里边，比如人考虑问题的一些因素，看一个问题，表述一个问题的语言，都有不确定性在里边，比如，热的冷的，好的坏的，治理污染和环境问题是要多花些钱还是少花钱？这些不确定性都可以反映到这个系统理论和方法里边来。

曾光明称这是一个系列的方法，有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同行公认最好，水平最高。“国外用我们教材，引用频次很高，很多老外写信向我们索要论文、软件资料。”

他一再讲到他的挚友——加拿大 REGINA 大学教授、湖南大学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黄国和博士，这实际上是他们在最初没有经费、没人指导的艰难的状态下坚持了 20 年的一个研究方向，他说还可能做 30 年。

再一个突破点是搞固体废物资源化研究，也是“863”高科技攻关项目及科技部国际合作重点资助项目。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主战场不是环境系统不确定性，而是水治理（把污水变成清水）、大气治理（把污染空气变成干净空气）及固体废物资源化。曾光明说湖南大学在他来之前，水和气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只是进入国家层面竞争，得不到高层认可。而他本人对这一领域过去涉猎不多，因此他决定扬长避短——做城市生活垃圾里的固体废物资源化方面的研究。但是市场有限，竞争相当厉害。

怎么找缺口？

曾光明分析：固体废物这个研究方向，全中国全世界都没有特别“优秀”的人，但固体废物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城市生活垃圾里边有分选设备、焚烧技术、填埋技术、有机物堆肥技术等等。

“我觉得科学性不强，就出不来高水平成果，学生就不愿跟你来做。搞填埋焚烧比较难招学生，日子不好受。然后我就分析固体废物。”

固体废物中有两类：有机废物和无机废物。无机就是石头、铁，等等。铁分捡出来回炼钢厂溶解；石头分解出来填埋，曾光明认为那里边缺少科学，不如做有机的，里边有细菌有化学问题微生物问题。

“过去做城市生活垃圾堆肥全世界都在做，但大家都觉得这个问题简单——不就是找个坑放进去变成肥吗？实际上这里边有时间长短问题——我们研究细菌，把有机物变成肥料的科学方法有很多问题要研究，时间一短就是科研成果，而且这里边的研究怎么做都做不完，比如开始 56 天，变成 55 天，50 天，都是很了不起的成果。”

曾光明就这样慢慢往前做。首先是细菌作用、表面活性剂作用，等等。这样作用，那样作用，慢慢研究，最后确定了这样一种方向，就开始自己做，带学生做。他说起初自己也不太有信心，但很快发明专利出来了，在国际刊物文章出来了。

“我自己做得不错，就‘鼓吹’学生吸引学生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一起做，就这样做起来。国内给钱，国际上很多人也来做，越炒越热。到现在，这个方向论文发表了近 200 篇，在国际大会上报告约七八次，发明专利申请了 22 项。实际应用和示范工程做得也很不错。”

解码四：动物“癖”——从儿时收养流浪狗到照顾环境馆大院里的猫们

环境馆大院内的大猫生下三只可爱的小猫，请各位老师同学关心和保护。

(1) 不要追赶恐吓大猫；

(2) 不要在院中放老鼠药伤害大猫小猫；

(3) 在外就餐记着剩下食物带些给大猫小猫。

保护爱护环境是我们的专业、事业，鼓励各位老师同学从小事做起。

(此文被阅读过 625 次——2005 年 1 月 4 日)

——湖南大学环工网实录

虽然曾光明不谈兴趣，只谈“搞饭”，但是凭借一位资深记者的敏感，我完全可以把握那其中不仅有故事，而且很精彩。

“一个以环境研究为自己终身职业的学者想必对环境问题有着某种渊源？”果然，听我以这样的“好奇”向他发问，他很认可。

“我喜欢做这事与我自己生活相关。”

他带我进入他儿时的另一个世界——

“我对自然、对动物、对环境的喜欢可以说是与生俱来。我记得自己六、七岁时还没上学，家里穷得饭不够吃，当时我就养狗，是收养流浪狗。说来也怪，我在外面，狗就喜欢我，跟着我走，我就把狗带回家住。小时候是偷偷的——母亲给一碗饭很快没有了，其实是喂了狗。”

“现在流浪狗也跟我走，也收留过。”他说，分析起来，一辈子研究环境跟这个有关系。

“现在环工系院里收养了很多流浪猫，过去就有，觉得怪可怜的，我放食物，也要求大家带食物来。”

“我家 120 平米，楼顶有个屋顶花园，家里有 80 来只鸽子，就在上边养着；有鱼，是很珍贵的龙鱼；有狗，一只非常好看的德国狗，是八年前我在宠物市场一眼相中的。”

说着他顺手打开电脑中他的家庭文档，搜索“图片”，一只大狗呼之而出：膘悍，威武，一副军犬的模样。

“我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是给鱼喂食，第二是把鸽子放出来，喂些食，同时我养的狗跟我上楼，拉掉大小便，锻炼一会身体。然后我开始吃早餐，狗陪着我，我吃上一口，它吃一点……我很高兴，然后和狗bye-bye——上班去了。

“它是我的贴身狗，贴身保镖。它喜欢我，我也喜欢它。我一回家，每一步它都围着我。我喜欢它的力量，它的温暖，它的气味，它的眼睛，像时装模特。我上班它守家，所有房间门都给它开着。没有小偷，很安全。”

听曾光明这些，想到“文革”，倘若退回到那“不食人间烟火”的年代会是怎样？光阴荏苒。幸运的是，如今，有事业会生活懂感情，才是人们心中的那类情调，那份完美。

曾光明对于动物的热爱以狗为甚，一次见“红网”上讨论打狗，他一气呵成30分钟写了一篇“檄文”，呼吁全人类要保护狗，保护生命。

如此之“癖”，缘何？答案还是在他。他说所有研究表明，惟有狗的基因里有爱人的基因，狗生来就是人的朋友，动物就是人，人就是动物，从这个角度看，人与狗是完全平等的。

难怪，他的电脑里积累了关于狗一大堆资料，有文字，也有照片；有爱狗的——73岁老妇救爱犬》，也有伤狗的——《女主人杀恋家犬》……“一打包就是一本书”，是为自己的机敏，还是为积攒了这么多自己喜欢的资料：反正他是一脸的怡然，可转脸又来了“情绪”：

“We are all decent human beings.你看，现在人都是体体面面的人，可是看见猫啊小动物恨不得一脚踹死。对生命没有爱护，亲情也是——母子之间，父子之间，一不高兴就把人打伤、致残、甚至要了人命，都是‘文革’带来的后果。”

这时，我很想知道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环境在曾光明这位卓有成就的环境专家眼里怎样？我以为，那里边应该有一种危机感乃至责任感。

“狗啊，猫啊，不是它们本身的问题，象清华大学马加爵用硫酸泼熊那种事情，是社会问题、人文教育问题。”

“我觉得现在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政府投入也很大，不只中国，而且是全世界。发展过程中环境遭到破坏，这方面我们中国的确存在不少问题，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水平的提高，很多问题就不再是问题，前景是乐观的。”

他又说，一味地保护自然环境，让大家永远地生活在自然森林、原始状态也不对。他认为一些发达国家希望我们这样，他们享受社会发展成果，让我们维护自然、原始的、不被破坏的动物、生灵，是很不公平的。

“您认为您在系里营造一种环保意识是否比别的学院做得好些？”

“肯定做得好。例如：我们系很多老师学生受我影响有几种动物就绝对不吃：蛇、狗、青蛙。我请你吃饭，这三种东西肯定没有；你请我，倘若你要上这三个菜，我会婉转讲是否可以不吃这个。当然有些场合上来了只能入乡随俗，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也是‘礼宾’上的一种需要。”

解码五：履历表——从“概率二项分布公式“到”挫折等于成功”

我不是那种可以天上掉馅饼的命；天上掉馅饼，我也绝对不接受，一定要通过自己努力才踏实些，否则一定没有好结果，

我做很多事情都在自我否定，做成一件事否定一件事，开始另一件事。

力所能及的事尽量去做，慢慢做，慢慢做，不知不觉就进步了。不要大事做不成小事又不做。

——曾光明采访实录

曾光明接受我采访本是在会议室，初识他就是在这儿，恍若昨日：两张普通的桌子一拼，四周几把简易的椅子一围，还有一溜儿椅子“待命”，这种简洁的风格如同他做人做事的风格，所谓文如其人、屋也如其人。

讲到兴头上，他要我去他办公室，说时迟，那时快，话音未落，却不见了踪影，我紧随其后，连喊几声没有应答，迷惑之中，碰巧走廊有人走来，带我找到他，这时的他绕过所有的寒暄直奔主题——

“你看看我自己在做什么？”他冲着面前已经打开的电脑，兴致勃勃地晃动着手下的鼠标一次次地点击着他的文档：

“我每天喜欢做的事情——论文、专利、著作、获奖……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这是我的论文，都有据可查，年年都有。”我顺势看去：1987年以来国际会议论文156篇，其中2004年33篇、2003年34篇……研究杂志论文1987年以来380篇……教学研究论文2002年以来28篇。

“这是教学论文，是我这些年教学实践的一些积累。”

“看着这些东西我就踏实，我就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

他似乎有些激动，我能体会那里边装载着的是他的心血，沉甸甸的，无以计量，也有一位“完美主义者”的欣慰。

“我的档案很齐。我从博士毕业四年之后开始，到现在已经独立和合作指导了很多研究生。”他的“学生文档”里填写着一排排名单，总共硕士128名、博士45名，色彩黑中有蓝，他告诉我蓝色表明已经毕业了。

“有人‘攻击’我带学生多是浮躁，是为要奖金？那就算算工作量：我培养一个硕士一年只有20-30个‘工分’，一个‘工分’只有10块钱，培养一个硕士生，我的个人收入没有300元，可一个学生参与课题的实际开销包括版面费、差旅费、实习费等……一年至少花我两万元。但是我很有乐趣。趁着年轻身体好赶紧多带些学生，当老师就应该多带学生，我喜欢他们。我对学生好，学生对我也好。带学生多，论文也就多，成果多，对国家的贡献就大。”

曾光明就是这样不无孩童般地坦荡直率，他甚至开玩笑地说，就象‘本拉登’，到处是我学生，搞什么事都容易成功些。他不排除自己有‘私心杂念’，但他非常严肃地坦言自己对每个学生都十分负责。

“我有一句话，原本是‘一句顶一万句’，后来改为‘创新之师造就创新之生’。”反过来，他也毫不客气地质疑：“老师‘笨蛋’怎么可能教出好学生？”

现在我手里有一篇曾光明为第一作者的署名文章《概率二项分布公式与学生不怕挫折的创新精神培养》，不妨一录：

关键词是：挫折；创新精神；成功；培养学生。

文中说：

“如何培养学生不怕挫折、勇于创新的精神，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我们还要用数学概率统计中重贝旁理试验方法中的二项分布公式和教师中的实例鼓励培养学生，使学生形成‘挫折’即是‘成功’的观念。

在递进式分析出一个个概率公式最终得出成功率计算公式之后，举例说明：

“如果每次‘追求成功’的成功率均为 $0.2(P=0.2)$ ，那么在两次‘追求成功’中($N=2$)的成功率是 $P=1-(1-0.2)^2=0.36$ ，在五次‘追求成功’中($N=5$)的成功率就是 $P=1-(1-0.2)^5=0.67232$ 。

随着‘追求成功’次数由一次、两次增至五次，我们目标的成功率就由 0.2 、 0.36 增加到了 0.67 ，意味着原存‘不太可能成功’的事件‘很有可能成功’。如果‘追求成功’次数

增至十次，依照上面的公式则算出，成功率将高达0.9，那就意味着‘几乎一定可以成功了。’

作者意在从以上从概率统计的角度印证一个道理：“在创新求索的道路上，成功总是属于那些精益求精、不辞辛苦、坚忍不拔的人。”

解码六：“怪”思维——从《水浒》情结到关注细节

知识经济时代，教授博士硕士就是《水浒传》里的英雄，就是武松打虎时的武松。

我要求学生第一要孝敬父母，不孝不是人；第二要孝顺导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第三要忠诚祖国，祖国永远是我们的母亲。

有人身体好，为什么事情没做好，是责任心不够。我们做事要么不答应，答应了就一定要做好。

——曾光明采访实录

不知为什么，年少时的曾光明就喜欢上了《水浒传》。他至今记得小学五年级时大气侯正在批“水浒”，可他偏偏就是喜欢得如醉如痴，以至于有时挑灯夜战读水浒，母亲却蒙在鼓里欣赏儿子在刻苦读书。水浒里的一百单八将梁山好汉他都喜欢，而最喜欢的还是公孙胜，他喜欢公孙胜在关键问题上能呼风唤雨，喜欢他会变巫术会破阵。

循着一个人的成长足迹，大体上都可以触摸到这个人的脉搏跳动及其魂灵深处。

水浒情结其实是英雄情结，这在曾光明身上已然是那么鲜明，只是那里边多了许多人世间最普通不过的血肉亲情和炎黄子孙的至尊的民族情怀。

“常会跟学生讲水浒吗？”

曾光明不正面回答，却自我鉴定讲义气讲感情。他说大的方面——人要有中国心，小的方面是‘七张嘴’。他理解“水浒”的“义”就体现在这些，是责任。

“李逵救母就是这个意思。现在救母要有钱，有房子住，还要宽敞。如果不努力，钱从哪来？其实，我们有这么多事要做，感情上有这么多牵挂，国事、家事、天下事，都是责任。”

他的责任体现俯拾皆是，只是方式不同，有他在常人眼里“怪”的个性，然无论怎样，殊途同归。

个性并不是某一类人、一群人独有的。在文明程度尚不发达的社会里，也许只要不合大众，不，很多时候是不合所在环境“习俗”口味的所谓“超群”便是“个性”，便是“怪”甚曰“怪异”。比如不媚俗，不迎合；比如心直口快，敢于谏言；比如多数人说东，你偏说西；事实上，许多真理就在“个性”、“怪”者手里。不是么？

有一种人很“简单”，他们能把在大多数人看来很复杂的事情变得很简单。曾光明就是这一类人。有例为证：他的实验室在做废水炼油课题研究，成果出来以后要把它推广到社会上，就有企业要与其合作。一般教授和企业打交道可能会较多考虑知识产权转让及其利益，曾光明不同，他只要对方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比如征地、买设备；只要对方认同亏赢责任要企业自我承担，而他曾光明，只用两三句话，无需合同，无需协议，对方企业就会卖劲地往前做，就把事情做成了。

“他成了，我的成果得到实现了，我高兴，他也高兴——双赢。”

当然，这要有两个基于自己实力和人品的前提：一是已经取得的成就；二是做事诚信的口碑。

“我觉得很多事都很简单，关键要有自己的正直，有自己的判断。”他认为自己看重的是成果本身的应用，“一来作为教授，我花的本来就是纳税人的钱，我就应该为社会做贡献，

区别只是要看贡献到什么地方；二来对方愿意跟我合作时我就尽量做好，比如他能把树栽起来，花开起来，我就会让它结出果实。”

这里，记者无心评判与企业合作的具体方式方法，只是单就曾光明本人的做事方式客观报道。因为，“条条大路通罗马”，如意就好。

象聊家常一样，我和曾光明的交谈进入《成功决定细节》，他向我推荐这本书。“我非常赞成从小事做起，也这样要求自己，要求我的学生。”

“您在您学生心目中是什么形象？”已是晚饭时分，也许他体察到我这样问已自觉有些突兀，便如一卷旋风随机叫来几位学生供我采访。

杨馥说：“他特别注意细节，追求完美。去年他给我们开会讲他刚来环工系时拖地，为了不让水滴到走廊上，他用桶来存水涮拖把。”

汤琳说：“他从来不用大教条告诉你什么，而是用行动，用他的思想，潜移默化。”

李明说：“他是我们心目中成功的典型，做什么事都很有把握；他只要全力以赴去做，没有做不成的事情，同学们都很钦佩。”

总之，他是老师。

诚如学生所感受的，他们的导师的细近乎“极端”——

儿子的班务会除非他不在长沙，一定要去，而且每次都会坐在他儿子坐的位子上，夫人坐旁边，他要让儿子有自豪感和被重视感，激发他更加勤奋地学习。因为在他看来，倘若将来儿子不成功将会是他最大的不成功。

“所有的学生给我发邮件我必回复，只是字多少的问题，这也是我的细节。我作为老师对学生一定是这个态度，做系主任再忙也不会不尽责。”

“每年全系的新生开学典礼及老生毕业典礼，我一定参加，一定是西装领带，讲话稿一定事先背熟。”

不仅如此，有学生结婚，曾光明一定会送红包，婚礼上的讲话也一定要事先准备好并背熟。“身教重于言教”，他是随时随地在给学生现身说法，“不讲话则已，要讲话一定要讲好；不露面就不露面，一露面一定要体体面面。”学生有升迁一类喜事，他也必送红包却躲开送行的应酬，“你走时我不请，等你走了以后我再请。”

其实，学生们不知他们的导师这些年一直在隐姓埋名地还资助了很多校外媒体报道的贫困生，“我是通过媒体一次性给他们钱，因此他们只知道是湖大教授。”

“我当老师肯定是称职老师，当父亲肯定是称职父亲。”

这样的细节里蕴涵着这样的责任，而这样的责任铸就了这样的个性。

坦白地说，面对曾光明，我曾经揣度过他的内心世界的纯真，因为这世间有着太多的诱惑，但是当我走进了他，我更加体会到，真正了解一个人一定要以事及人进而解读他的心灵。

本文将封笔之际，我愿意引用一本号称“全球销量超过8亿册的畅销书”——《把信送给加西亚》里的一段话，送给接受我采访的曾光明教授，也送给点击并阅读本文的每位读者，当然还有我自己：

“世界会给你以回报，既有金钱也有荣誉，只要你具备这样一种品质，那就是主动。”